

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刍议

严清华 常庆欣 杜长征*

摘要：人们已越来越多的注意到，在资源配置领域中，除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之外，客观上还存在着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等第三种力量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即第三配置。由此便引出了经济学丛林中一门亟待研究的崭新学科——第三配置经济学。与研究市场配置的市场经济学和研究政府配置的政府经济学相区别，第三配置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第三种力量的配置，即第三配置的机制、特点、效益及其规律性。其研究对象是第三配置；研究内容包括第三配置基本动力、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核心内容是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主要任务是阐述第三配置的基本原理，揭示第三配置的内在规律，并建立第三配置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主要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还需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

关键词：第三配置 第三配置经济学 第三只手 第三配置功能

一、资源配置理论的“缺口” 与第三配置问题的提出

每当人们谈论资源配置问题时，便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这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最基本方式。但人们也越来越多的注意到，除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之外，客观上还存在着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等形成的第三种力量对社会经济资源发挥着重要的配置功能与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拉蒙·H·迈耶斯将资源配置方式分为四种，他指出：“有四种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经济体制中可以分别或共同运作。第一是互惠，即在某个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规范，以社会为单位，或单个个人地，或集体地交换资源。第二是基于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即保护人将某些资源分给某个被保护人，以换取被保护人提供的东西，通常是劳动。第三种形式是，由国家下达命令进行的资源配置。……最后一种是契约安排”^①。迈耶斯所说的第二种方式是存在强制性劳动交换条件下的一种配置，实际上是政府强权统治下的一种具体配置方式，第三种方式是政府配置的另一种表述，第四种方式是典型的市场配置。迈耶斯所说的第一种方式则是通过习俗和文化规范进行的配置，类似于

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配置。^②

从历史起源上看，“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品。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③政府配置是政府出现以后的事，史蒂文斯认为，“政府的本性就是运用强制并有能力使消费和生产模式偏离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或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所偏好的模式”^④。在这两种配置方式发挥作用之前，事实上即已存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种力量开始以极为原始的方式发挥着配置功能与作用，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后来的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的“习俗经济”^⑤。原始人在既无市场又无政府的情况下，完全靠习俗、惯例、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来配置社会经济资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⑥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在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下，仍然需要第三配置发挥必要的补充作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非交易活动，如公益活动、慈善活动、社群活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同乡、邻里关系等，就需要靠第三配置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即令在交易活动领域和由

* 除署名作者外，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组织过多次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吴传清、刘穷志、龚文德、孙智君、游士兵、曾丹、杨丽艳、宋琼、邓江峰、遂建、方小玉、彭晶晶、何芳、张燕等。

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关系中,第三配置仍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以分配领域为例,人们通常称由市场按生产要素所进行的分配为初次分配,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等方式进行的分配为再分配;但此外还事实上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即“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它是“纯粹出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而引起的收入转移、自愿缴纳、自愿捐献”^⑦。第三次分配就完全是靠第三配置发挥功能与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市场秩序的有效维护既要靠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监管,也要靠第三配置功能与作用的发挥。无论市场配置还是政府配置都离不开道德主体的操守自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本身也蕴含或体现了第三配置的功能与作用。

与第三配置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人们对于第三配置的研究却显得相形见绌。大约40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就指出:“在经济学的发展上有过一个阶段……,其时经济学家们都埋头于市场经济学上,以致都不愿意考虑任何其他事情——不愿意承认还有别的什么体制可供选择。”^⑧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道格拉斯·诺思也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理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么,我们解释现行资源配置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便会有很大的缺口。”^⑨尽管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对非市场体制应更认真地加以重视”^⑩,但这种重视仅及于政府配置和政府经济学,而对于第三配置和第三配置经济学的关注与研究却仍处于被漠视或忽视的状况。这种状况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当我们发现这一理论“缺口”时,也就是这一理论“缺口”亟待弥补而又即将得到弥补的时刻了。

二、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配置经济学是经济学丛林中一门亟待研究且正在破土而出的崭新学科,它是研究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之外由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等第三种配置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特点、效益及其规律性的科学。简言之,它是研究第三配置机制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⑪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是由它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

概略地讲,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第三配置。如前所述,第三配置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由第三种力量所进行的配置,即是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的配置力量之和。具体来说,第三配置包含了十分丰

富的内涵。

首先,从动力源泉上看,第三配置主要包括三大社会力量。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是一个有别于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概念。市场力量是作用于市场配置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政府力量是作用于政府配置并使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履行其职责和扮演相应角色的力量,社会力量则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之外的第三配置力量。它大体涵盖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精神力量,它是来源于社会意识、精神世界的力量,如世界观、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想意识等,它是支撑人们行动的精神动力源泉;二是社会制度力量,^⑫包括成文的社会正式制度如乡规民约、社团规章、协会章程等,以及不成文的社会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社会规范、行为模式等,它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潜意识规则;三是社会组织力量,包括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它是以组织形式存在的第三配置力量。这三种社会力量汇集起来,共同构成第三配置的力量源泉。

其次,从内容结构上看,第三配置大体包括三大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处于基础地位的习俗、惯例、行为模式、先验偏好和思维定势等。它是人们在长期接触与交往中通过相互模仿、选择而传承下来的惯性方式,它告诉人们“怎么做”,属于操作层面的内容。第二个层面是处于上层领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价值被定义为在人的选择和公共行动中一再显露出来的强烈偏好。它们被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置于很高的序位上。”^⑬它对人们的所做所为和所思所想做出价值判断并加以指导,它告诉人们“怎么样”,属于思想指导的内容。第三个层面是介于上述两个层面之间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乡规民约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社会组织如志愿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它告诉人们“做什么”,属于中间层面的内容。借用《易经·系辞》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如果把第一个层面的内容称为形而下的“器”的话,那么,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即可称为形而上的“道”,第三个层面的内容介于“道”和“器”之间,既非“道”也非“器”,但同时既有“道”也有“器”,因而可称之为“形而中”。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再次,从表现形式上看,第三配置可分为两大类、五种形态。两大类别是指“无形”与“有形”。所谓“无形”,是指以隐形、潜在形式存在的内容,包括完全处于“无形”状态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相对处于“无形”状态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两种形态。所谓“有形”,是指以显形、外在形式存在的内容,包

括以文字形式存在的乡规民约、社团规章、协会章程等,以事例形式存在的习俗惯例、行为模式等,以及以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的志愿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三种形态。如果说,在表现形式上,市场配置是“无形之手”、政府配置是“有形之手”的话,那么,第三配置则既“无形”又“有形”,它是兼具有形无形的“第三只手”。

这样的第三配置,表现出如下五大特征:

(1) 社会性。第三配置的力量源泉既不来自于市场,也不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社会。对于市场来说,它是非市场化、非营利性的;对于政府来说,它是民间性的。简言之,它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力量,^⑭充分体现了其社会性特征。

(2) 广泛性。第三配置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交易活动领域和非交易活动领域,调节人们行为的大部分空间,其作用范围比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更宽、更大,因而更具广泛性。奈特就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深思熟虑的行为都受到要得当或做得正确之意愿的影响”^⑮。

(3) 自发性。第三配置的许多内容是由文化遗传和生活习惯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既非市场的理性设计,也非政府的计划安排。人们对某种文化传统、习俗惯例的遵循往往是出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人们信奉某种观念、参加某种社会团体或组织也是自发选择的结果。第三配置的实施也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与方式,维持其存在和发挥其作用的力量来自集体内部的相互学习效仿、集体成员的从众心理和自觉意识以及虽来自外部但却属于软性的舆论压力。与政府配置依靠公共权力强制执行和市场配置依靠利益机制的强大约束相比,第三配置对于经济主体来说是一种“软约束力”。

(4) 相对稳定性。第三配置的具体内容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延续下来,其变迁是一个长期、缓慢、渐进的过程,不会形成瞬间突变的机制,它会长期发挥其作用与功能。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会在人们的头脑中不断得到自我强化,通过正向反馈机制的作用而进入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形成第三配置路径依赖偏好。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在非正式限制中,……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文化发展中形成的非正式限制,不会受正式规则改变的影响而立即改变。”^⑯

(5) 空间封闭性。第三配置的作用往往是附着于不同社会实体及其关系网络之中的。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往往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难以原封不动地加以移植和复制。阿马蒂亚·森在分析家族经营企业时曾明确指出:“在家族经营企业里的那种隐含着相互信赖与责任感的生意和行为模式,似乎

有它本身可清楚界定的作用范围,试图把这种行为模式普泛施行于其他行动范畴不一定能取得同样的成功。”^⑰

第三配置所表示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对应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资源配置方式而言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对社会因素的经济影响所做的一种经济学语境意义上的表述与概括。目前学术界的类似用语还有“第三种调节方式”^⑱,其含义与“第三配置”大体相同,但更侧重于从管理学角度立论,更侧重于应用性与操作性,不像“第三配置”概念那样经济学的意蕴更为浓郁与深邃。相关的用语还有“第三部门”,它是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指的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各种社会组织如志愿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等。“第三部门”是“第三配置”的重要力量来源或实施主体,而不是“第三配置”内容的全部;同时它是从社会结构视角提出的概念,尚未突出对其经济功能进行深入考察。还有“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提法,那是从资本的视角,针对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及文化活动而提出的概念,从内容上看,是涵括在“第三配置”范围内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概念或提法,如“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大都可以从“第三配置”的视角来加以解读。

总之,在社会因素的经济影响问题上,第三配置是一个与目前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有关提法相比,经济学意蕴更浓更深、学理性更强、也更具整合力的概念,它的内涵决定了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范围,决定了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学科边界。

三、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由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它是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细化、深化和具体化。研究对象界定本学科研究“谁”,研究内容则进一步回答本学科研究“什么”。

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三配置有其自身的运作机理与运行机制,它的内在动力、各种因素必然发生相互影响与制约,并形成有规律的运行。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正是第三配置基本动力、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

这里涉及一个核心范畴,就是第三配置的功能问题。所谓第三配置功能,指的是第三配置产生影响、发生作用的功用、职能。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它的重点是第三配置对经济的影响,亦即第三配置经济功能的发挥。换言之,第三配置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应是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问题。之所以把

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作为第三配置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第三配置经济学是继市场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之后产生的学科,是基于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需要发挥第三配置作用与功能这一逻辑推论从而引出的研究课题,因而研究第三配置经济功能是第三配置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基本要求。

第二,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是第三配置的核心功能和本质功能,它决定和影响第三配置在资源配置中所处地位及其作用的大小,对于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来说,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居于主导和核心的位置。

第三,第三配置经济学是一门经济科学,只有从经济功能的视角出发才能把握其作为经济科学的方向,突出其经济学的学科特色。

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进行考察。

从微观层面看,第三配置的基本经济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或生成“第三产品”。一般来说,市场配置的基本经济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政府配置的基本经济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第三配置为社会提供的则是既非“私人产品”又非纯“公共产品”的“混合产品”,即我们所说的“第三产品”。所谓“第三产品”,它所指的是以信用、良好习惯、优良传统、共同意识等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是因为它们也需要耗费社会资源,也需要支付成本并取得效益;之所以称之为“第三”,是因为它们是在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之外由第三种配置力量生成的产品。

从中观层面看,第三配置的基本经济功能在于形成“社会资本”^⑨。“社会资本”是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资源和力量,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取投资回报的资本。从第三配置经济学角度考察,它实际上是“第三产品”从微观个体扩展至社会群体、从“产品”形态转化为“资本”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第三配置中观经济功能的集中体现。

从宏观层面看,第三配置的基本经济功能在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和谐。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关键,没有经济和谐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指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和谐,包括经济关系和谐、经济制度和谐、经济运行和谐和经济发展和谐等。第三配置促进经济和谐的基本功能是由第三配置的性质与特征决定的,如果说,市场配置遵循利益原则而以讲求效率为唯一目标,政府配置履行经济管理职责而以实现社会公平为重要目

标的话,那么,第三配置的重要职责与总体目标就在于促进社会的经济和谐,这是第三配置宏观经济功能的具体体现。

第三配置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功能彼此相联,相辅相成。其中,微观经济功能生成第三配置的经济基础,中观经济功能培植第三配置的中间力量,宏观经济功能达成第三配置的总体目标,也就是说,第三配置是通过生成“第三产品”,形成“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和谐的。

以第三配置经济功能为第三配置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必然引伸出一系列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例如,何谓第三配置经济功能?它有什么经济功能?由谁来发挥它的经济功能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发挥它的经济功能?它的经济功能是怎样发挥出来的?发挥它的经济功能是否需要支付成本并取得效益?它的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否也存在“失灵”现象以及如何对其“失灵”加以矫正?对于这些问题,第三配置经济学必须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做出科学的解析与说明,做出合乎客观实际与历史逻辑的系统阐释与理论解答。因而,这些问题也就构成了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为研究第三配置机制及其规律性的科学,第三配置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研究任务,既有理论上的任务,也有实践上的任务。

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理论任务是由第三配置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门经济科学,它必须反映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必须揭示特定对象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与作用原理。具体来说,第三配置经济学至少需要完成如下三大理论任务:

(1) 阐述第三配置的基本原理。包括第三配置的内涵与特征,第三配置的基本功能、作用领域与表现形式,第三配置的作用主体及其动力来源,第三配置的运行机制与作用原理等。

(2) 揭示第三配置的内在规律。包括第三配置的自身运行规律,如它的基本规律,它的运行机制的生成及其运行机理等;第三配置与市场配置、政府配置的内在联系,如它们各自的作用领域与功能边界,它们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等;第三配置与经济行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们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等。

(3) 建立第三配置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任何一门学科,它之所以成其为独立的学科,就在于它具备研究内容明确、内在联系紧密、逻辑体系严谨、学科边界清晰的理论构架与学科体系。学科体系的形成

是一门学科得以独立问世的首要条件和根本标志。第三配置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创立的学科,它必须建立这样一种严密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必须反映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精神,具有科学完备的理论基础,围绕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所规定的核心内容展开全面系统的阐释与理论分析。

第三配置经济学在实践上的任务就是要为现实服务。一门学科的问世与兴起,总是与一个时代的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和自由市场对道德的破坏已经昭然若揭,招致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批评。我国目前又是典型的转型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规范缺失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急需加以消除。在此种情况下开展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自然需要完成现实服务的诸种任务。

首先,它要科学地解析第三配置领域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如信仰危机、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等问题,并让人们从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审视和认识社会上存的其他现象,如个人崇拜现象、拜物教现象、腐败现象等,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其次,它要为国家合理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思想指导,为国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再次,它要为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行以人为本管理和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理论解释并提供有益帮助;最后,它要为人们发扬优良传统,养成良好习俗,遵守社会规范,加强操守自律提供行为指南。

五、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第三配置经济学本质上仍是一门经济学的学科,因而,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仍适用于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的。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它研究具体历史条件下第三配置的机制及其规律性,探讨其基本动力、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换言之,第三配置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和研究方法的。

西方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使用方式间的配置”^⑩,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诸多理论与流派,其中许多理论与流派的分析方法也是适用于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的。例如,从古典学派开始,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解释人们一切经济

行为的根本“法宝”,这一方法完全可以用来剖析第三配置主体的行为动机。西方制度学派重视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他们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⑪其中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方法也完全适用于第三配置经济学的分析。制度学派强调制度的协调功能与激励-约束作用,一方面认为制度是解决社会协调与合作问题从而产生群体利益的工具,因为纯粹“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可能往往伴随着欺骗、逃避责任、盗窃、袭击及谋杀”^⑫;另一方面认为制度是约束或激励理性经济人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制度是从利益冲突中产生的“切实可行的相互关系”,并创造了“预期保障”的规则,^⑬这些观点与分析为我们探讨第三配置的经济功能与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制度学派的代表者科斯等人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他们视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标志,这一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对第三配置经济功能绩效的考察。拒绝普遍存在于新古典分析中的非现实观念,聚焦于变革、学习和创造力、技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研究的演化经济学对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启发。就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行为经济学也是研究第三配置经济学时一个足以引起重视的流派。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博弈论方法会成为第三配置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盖瑞·J·米勒认为,“在重复博弈的分析框架下,关于合作、文化、信任、协定与领导等等这些传统的系统概念被赋予了崭新且生动的意义。”^⑭博弈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包,它被设计用来帮助理解所观察到的决策主体在相互作用时的现象,博弈论模型是对生活状况的高度抽象概括,“这种抽象性使得它们可被用来研究范围很广的现象”^⑮。意识形态市场上的选择问题,交易过程中的诚信构筑,习俗的生成及其作用的发挥,社会规范的确立与行为主体的自觉遵从都可以在不同的博弈模型下加以研究。

除经济学的方法之外,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运用一些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亦即需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Hirshleifer曾强调了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他指出:“经济学家几乎也不能否认人们想买卖什么会受到文化、种族,甚至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通常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还会遇到包含在法律和社会学中的问题。”^⑯好的经济学必须也是好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与心理学。^⑰阿马蒂亚·森强调了政治学、伦理学甚至工程学方法的运

用,他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⑦第三配置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经济学,而且也是一门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的科学,因而,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是适用于第三配置经济学的研究的。总之,第三配置经济学只有运用多学科、多元化的方法才能完成自己的学科研究使命。

注释:

①[美]拉蒙·H. 迈耶斯:《晚清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3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第三配置包含迈耶斯所说的互惠式调节,但内容远比互惠更为丰富。

③[美]F. 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文版,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④[美]J. B. 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中文版,1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⑤[英]约翰·希克斯认为习俗经济是最早的非市场经济体制。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⑦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77、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⑧⑩[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文版,1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⑨[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文版,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⑫含社区及区域制度力量。Suttles(1960, p. 304)对北美西北沿岸印第安人的礼物交换制度的研究发现,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社区内高水平的食物生产,以及平滑社会间和社区内的食物消费,此机制是一种对资源变化的适应。Moore(1957, p. 73)对Montagnais - Naskapi以占卜来随机选择打猎路线的机制研究表明,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开固定区域狩猎使该地区的动物被过度捕杀,从而改善部落的生存机会。这两种研究充分表明社区及区域制度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具体影响。

⑬[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文版,38~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⑭美国政治学家柯亨和阿拉托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社团)、社会运动以及大众沟通形式所组成”(Cohen, J. L. and Arato, A.,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 IX)。

⑮[美]弗兰克·H.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文版,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⑯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4 - 45.

⑰[印]阿马蒂亚·森:《理性的傻瓜——对经济学的行为主义基础的批判》。见[美]亨利·哈里斯编:《科学与人》,中文版,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⑱参见厉以宁:《论习惯与道义调节》,载《光明日报》1997 - 06 - 23;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严清华等:《路径依赖、管理哲理与第三种调节方式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⑲从一些学者所认定的社会资本的传统,可以充分认识到社会资本在第三配置分析框架下的功能。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对于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个传统:杜尔凯姆(Durkheim)和帕森斯(Parsons)的“价值融合”,指的是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互惠交易”,指的是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的“有限度的团结”概念,指的是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韦伯的“强制性信任”,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Alejandro Portes;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1993.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8, No. 6, pp. 1320 - 1350)。

⑳[美]E. 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应用》,中文版,16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㉑或者使用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概念,“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它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其例子既有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的礼貌和商业习俗,也有盎格鲁 - 萨克逊社会中的自然法。……外在制度是自上而下地被强加和执行的。它们由一批代理人设计和确立。”([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文版,36~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㉒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p. 11.

㉓Commons, John R., 1950. 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 104.

㉔[美]盖瑞·J. 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㉕[加]马丁·J. 奥斯、[美]阿里尔·鲁宾斯坦:《博弈论教程》,中文版,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㉖Jack, Hirschleifer, 1985. “The Expanding Domain of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6, p. 53.

㉗[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文版,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参考文献:

1. Joseph, Henrich, 2000. “Does Culture Matter in Economic Behavior? Ultimatum Game Bargaining among the Machigueng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4, pp. 973 - 979.

2. Paul, T. Homan, 1927. “The Impasse in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6, pp. 776 - 803.

3. Ayres, C. E., 1936. “Fifty Years’ Developments in Ideas of Human Nature and Motiv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26, No. 1, pp. 224 - 236.

4. Norman, Frohlich, 1974. “Self - Interest or Altruism, What Differenc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8, No. 1, pp. 55 - 73.

5. Barbara, Voorhies, 1973. “Possible Social Factors in the Exchange System of the Prehistoric Maya.”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8, No. 4, pp. 486.

6. Walter, A. Weisskopf, 1949.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7, No.

4, pp. 304 - 314.

7. Richard, B. McKenzie, 1979. "The Non - Rational Domain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c Analysi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46, No. 1, pp. 145 - 157.

8. Richard, Chase, 1980. "Structural - Functional Dynamics in the Analysis of Socio - Economic Systems: Adaptation of Structural Change Processes to Biological Systems of Human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39, No. 1, pp. 49 - 64.

9. Ryh - Song, Yeh. and Lawrence, John, J.,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nfucian Dynamism: A Note on Hofstede's Culture Root to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26, No. 3, pp. 655 - 669.

10. Vernon, W. Ruttan, 1988. "Cultural Endowments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nthropolog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6, No. 3, pp. 247 - 271.

11. Julio, Carranza, Valdes and Richard, Stoller, 2002.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Some Considerations for Debat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9, No. 4, pp. 31 - 46.

12. Richard, H. Franke; Geert, Hofstede and Michael, H. Bond, 1991. "Culture Roo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search Not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2, pp. 165 - 173.

13. David, M. Kreps, 1997.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trinsic Incentiv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pp. 359 - 364.

14. Johannes, Fedderke; Raphael, de Kadt and John, Luiz,

1999.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fle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8, No. 5, pp. 109 - 745.

15. Robert, B., Denhardt and Philip, W. Jeffress, 1971. "Social Learning and Economics Behavior: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Soci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30, No. 2, pp. 113 - 125.

16. David, Charny, 1996. "Illusions of a Spontaneous Order: 'Norms' i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44, No. 5, pp. 1841 - 1858.

17. Robert, C. Ellickson, 1998. "Law and Economics Discovers Social Norm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No. 2, pp. 537 - 552.

18. Richard, Ball, 2001.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73, pp. 57 - 84.

19. Moore, K. O., 1957. "Divination: A New Perspectiv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59, pp. 69 - 74.

20. Suttles, W., 1960. "Affinal Ties, Subsistence, and Prestige Among the Coast Salis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62, pp. 296 - 305.

21. Irving, Louis, Horowitz, 1964. "Soci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23, No. 4, pp. 351 - 374.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K)

(上接第7页) 力价值边际递增, 劳动力使用价值边际递减, 所有者和需求者讨价还价的空间缩小, 最终趋于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需求价格和市场价格相一致的状态, 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消失。就是说, 当市场均衡时, 劳动力的边际价值和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一致, 剩余价值并不存在。

(三)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并不必然导致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

在市场的非均衡状态, 生产资料的私有者作为劳动力的需求者能够获得消费者剩余, 劳动力的所有者能够获得生产者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高于以劳动力的边际价值为依据的供给价格, 剩余价值存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获得, 另一部分为劳动力的所有者获得。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能够使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 但不一定是占有剩余价值的全部。在市场的均衡状态, 剩余价值并不存在, 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得不到消费者剩余, 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得不到生产者剩余, 从而可以得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必然导致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对传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理论的否定, 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理论的扬弃。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因为社会主义不允许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 所以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科学运用宏观经济政策, 促进和维护市场均衡。市场的均衡态总是相对的, 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客观存在的,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会导致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产品, 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不可避免。因此, 需要通过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 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因为我国的市场不很健全, 供求失衡的问题客观存在, 所以, 我们一方面要想方设法促进和维护市场的均衡, 同时也要制定公平正义的政策措施。党和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26卷(Ⅲ), 139、159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26卷(Ⅰ), 43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③④⑤⑦马克思:《资本论》, 中文版, 第1卷, 50、51、52、53、193、219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⑥⑨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 上卷, 8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⑧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8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长沙 410079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经济研究所 长沙 410100)
(责任编辑: K)